

收稿日期:2021-05-21

席勒“游戏”美育观及其社会意义

丁昕春

(淮阴师范学院 音乐学院,江苏 淮安 223300)

摘要:在西方美学思想中,席勒第一次提出了审美教育的概念。面对工具理性、实用理性主宰的时代所带来的人性割裂困境,席勒认为,只有艺术才享有绝对的豁免权,不受专制的束缚。他主张让艺术审美成为人们一种交往方式,并坚信唯有通过“游戏”性的审美,才能改变人的异化状态、弥合人性的分裂,从而走向自由,最终达成人性的完满与和谐社会的建立。他的当代批判性美育观,即使在今天仍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审美;游戏;自由;席勒;艺术

中图分类号:B51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1)04-0021-07

作者简介:丁昕春(1971—),男,江苏淮安人,淮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音乐教育、艺术学理论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1.04.047

一、“游戏”美育观生发的契机

席勒(Schiller)的美育观形成于1792至1796年间。此时的欧洲正值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让德国人对暴力革命的态度由起初的热烈向往转向深刻反思,这无疑构成了席勒美育观生发的时代契机。席勒拒绝应时而作的时评与政论,把视线落到了人性,聚焦到了审美。在这段时间,他写出了《审美教育书简》《秀美与尊严》《论美》《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等一系列高质量的美学文论,从而开启了现代美学反思性批判的大幕。其中,《审美教育书简》(以下简称《书简》)集中表达了席勒的核心美育观,这本书也被哈贝马斯(Habermas)评价为“现代性美学批判的第一本著作”。这本著作由二十七封书信构成,内容虽简短,思想却非常深邃,充满着对人性 and 人类的关切与仁爱精神。在《书简》中,席勒发出了“在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启迪中,艺术审美的最终作用是什么”的追问。这是自柏拉图以降,还从未有人如此追问过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将关于感性论的理论构想,以及对文化与文明史的深刻批判与反思,用建构性的解决办法结合在一起,面对自身所处的那个充满现代文化危机的时代,对审美教育寄予了厚望,因此,他提出了著名的“游戏”美育观。

席勒美育观生发的另一契机,是康德(Kant)先验人性论的哲学思想和温克尔曼(Winckelmann)以来德意志文化学者们所提出的人文主义教化思想。在与朋友费希特(Fichte)进行的关于教育和道德哲学问题的讨论,以及与伙伴歌德(Goethe)等思想思辨的碰撞中,寻找到了他需要解决的关于人与文化一般问题以及关于人性自由问题的答案。席勒的美育观是在深入研读康德“三大批判”,借鉴了其认识论框架、美的基本理论及其与认识官能的关系论述的基础上建立的,他意图沿着康德的脚步,解决感性兴趣与理性义务的分裂和对立问题。虽然席勒思想在源头上直承康德而又受启于费希特和歌德,但却依然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康德等人走得更远。康德意图借审美判断力在作为感官之物的“自然领地”与作为超感官之物的“自由领地”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而席勒试图把美的“游戏”冲动置于从“感性活动”向“道德自由”过渡的中间地带,两者的思维架构似乎有所雷同,但两者思考逻辑与方式全然不同。席勒提出的“美是游戏冲动的对象”,明显有别于康德“美是道德的象征”观点。虽然席勒与康德都把“自由”视为关联于“自然”与“道德”的根据,并与人格紧密相联。但不同的是,康德是在“自由概念的领域”经实践理性认定后,通过“审美”而寻求它与“自然概念领域”的贯通;而席勒则认为,不经由“审美状态”的陶染,人便无从由“感性状态”达致“道德状态”的自由。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康德说来,“美”不过是“道德的象征”,而席勒却称“美”是“我们的第二造物主”^[1]。

席勒的美育观影响了后世很多哲学家对美的思考。谢林(Schelling)的“艺术哲学”显然留有席勒《书简》的印痕;黑格尔(Hegel)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著名命题,也隐约可溯源到席勒在《秀美与尊严》中的一个提法,即“人的结构美在性质上是理性概念的感性表现”^[2]。席勒的美育观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新的视野,他基于构建完美人性的这样一种全面、深刻、辩证的美育思想,即使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也依然对当代,对我们现代人具有强有力的启示作用。长久以来,席勒的美育观在艺术教育中却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细致的探究,这也使得本文接下来对席勒美育观的解读更有其必要性。

二、审美通过“游戏”而达到当代人性的自由

席勒美育观的核心是将审美与人的全部生命活动联系在一起,他相信,通过“游戏性”的审美,可以让艺术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层面,在主体达致自由的过程中,诠释了人性对无限美好追求的必然性。

(一)“游戏”乃一种自由的生活态度

席勒从语义上对“游戏”一词进行了解读,他认为“游戏”一词是用来表示一切在主题和客体方面都不受强制的东西,“是需要与法则恰到好处的中间地带。所以它不仅摆脱了需要的强制,也摆脱了法则的强制。”^{[3]46}简而言之,即是心灵上自由与平静的一种状态。

《庄子·田子方》中有这样一段表述:“孔子曰:请问‘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在这里庄子借老子之口表达了“游”是人只有在一种物我两忘的自由状态中,才可以体会至美与至乐,才能达到人性最完满的状态,此时,庄子将“游”诠释为完满之人至善至美的状态。此思想与席勒的由审美才能达至完美人格的思想是一致的。中文中的“游戏”作为一个完整词的使用,始于《韩非子·难三》中所载:“管仲之所谓‘言室满室,言堂满堂’者,非特谓游戏饮食之言也,必谓大物也。”这里主要表达为随意、玩乐之意。把“游戏”还原为语言最原始的状态来把握,是为了寻“游戏”之根,探“游戏”之本质。在人的天性中,游戏也是人的一种本能,本就根植于人性的深处。由以上对“游戏”的语义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游戏”一词有两层意思,一是被看作一种游乐、玩耍的活动形式;二是对“游戏”态度与意境的感受与体味,席勒和本

文探讨的都着重于后一种。

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我们怎样思维》中,曾对此做过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游戏态度就是一种自由的态度。有了这一态度,人们就不必再拘泥于事务的物质特性,也无需关心一件事情是否‘真正’意味着‘它所比拟的东西了’。”^[4]在此,他肯定了“游戏”作为一种活动形式的意义,但更重视对游戏态度的感受。匈牙利学者阿格尼丝·泰勒(Agnes Heller)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游戏’从不强制,它不能也从不是被诱使的。它是‘肯定的自由和否定的自由的融合体’……无论是肯定方面还是否定方面占主导地位,在游戏中所牵涉的自由都是主观的。”^[5]无论是杜威,还是泰勒,都强调了游戏的主观能动性,而这种主观能动性基于的根本即是自由。中国老庄思想中“游于天地之间”“游于四海之外”等观点都同样表达了这样一种解脱束缚、我即是我的自由生活态度。

“实际上,游戏的奥秘和乐趣正在于,它表明了人们对另一种生活的希望。”^[6]赫伊津哈(Huizinga)说“正是通过游戏,人类社会表达出他对生命和世界的阐释”^[7]。这种阐述体现了多方面的含义:生命的驱乐性在游戏的愉悦性中得以体现,生命的能动性在游戏的自主性中得以体验,生命的自由性在游戏的自发性中得以体验,生命的激情性在游戏的冲动性中使人得以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说,游戏就是人生命活力自由的多样展现。当代语境下,自由的生命体验是多么的珍贵,而席勒“游戏”式的美育观,则给在紧张生活状态下的我们,指出了一条通向自由的道路。

(二)审美“游戏”乃一种自由的生命体验

席勒对美的论述其实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以艺术为例,艺术家在创作艺术作品,欣赏者在欣赏艺术作品时,就都如同游戏活动中的儿童一样,此时每个人都会创造出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自由的意象世界。或者说,他们都在用另一种新的方法重新安排在他那个世界里的物。在艺术家们预先设计好的美好情景中,通过“游戏”态度,获得的结果必然就有了“乌托邦式美好”的情感色彩,而这种“美好”情景往往就是人类生存的极佳状态,因为它实现了人们心理和生理上“一种替代性的满足”^[8]。正如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说的:“艺术通过让物化了的世界讲话、唱歌甚至起舞,来同物化作斗争。忘却过去的苦难和快乐,就可把人生从压抑的现实原则中提升出来。”^[9]

席勒审美“游戏”的美育观,继承了康德“艺术和游戏类似”与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余力说”的哲学观点,并在其基础上加以发挥。在席勒看来,游戏和艺术本身都是一种精力过剩的表现,同样是不带任何实用目的的自由活动,如果能摆脱了物质上的匮乏而有了精力上的盈余,人就可能进入审美的游戏。席勒认为,就生存竞争的需要来说,生物是受必然律支配的,只有在与美的游戏里,生物才是自由的,审美游戏的冲动可以使人摆脱了一切外在强制的枷锁而进入自由的王国。

斯宾塞(Spencer)从生物学角度阐释了游戏与动物剩余精力之间的关系,理论影响甚大。他认为,人们在劳动工作之余,常常需要通过一种游戏的方式来发泄剩余精力。人们也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在愈闲暇松散时,愈觉得生活的单调,愈感到苦闷,总希望有些偶然的事来打破静寂,希望有些刺激来激发活力。所以,对游戏和艺术的需要,在人轻松闲暇时也会愈紧迫,就这个意义来说,“精力过剩说”(或余力说)确有几分道理。“人们为了寻求生命的答案,总是通过各种实践去不断变换身心自由释然的游戏,这种不断超越以求更新的活动可以说是倾听生命律动的行为。”^[10]

绘画大师德拉克洛瓦(Delacroix)说:“苦闷是活动和幻想最强的激动剂。心在苦闷时,对目前的时间和内心的节奏都感到乏趣,它除了这个节奏的单调和这个时间的悠久之外别无所感。

因此,它希望从这个沉重而空虚的时间中跳出,去寻求生气蓬勃的瞬息,去寻生活的丰富和圆满。”^[11]夸美纽斯(Comenius)说,应该“在白天的工作里面穿插一些舒畅、娱乐、游戏、欢娱、音乐之类的消遣,去振刷内外的感官是有益处的”。“游戏性”的审美自由可以带来精神主体上的自由。这种自由体现在审美的游戏中,“可以更加随心所欲地在生命活动中营造审美场景,营造无拘无束的精神空间。而这不仅丰富了个体生命的愉悦体验,更将生命体验向上提升,拓展了精神境界的纵向空间,甚至最终将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融为一体”^[12]。

游戏和艺术审美虽相类似,但毕竟是两种事项。两者也存在着明显的相异性。游戏不必有外在客观目的,如孩童在游戏时常沉浸在自己快乐的世界里,并没有要拿游戏来博得别人夸赞与同情的意思,也不必有欣赏者,尽兴极欢就是目的。换言之,游戏和艺术虽同是把意象加以客观化,造就另一世界,可游戏的意造世界是“逢场作戏”的,转瞬即境迁。席勒与其他理论家用游戏来比拟艺术时,注重的是游戏本身所具有的自由、无目的性的特质。但艺术审美不仅仅如康德所说的,是一种无利害的自由愉悦,一种并无外在实用目的的活动,这种认识只是从纯粹审美本身来探讨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艺术品具有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形式,艺术品必须好像显得是一种内在的合目的性,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外在目的的概念。事实上,首先,艺术家的创作也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其次,艺术除“表现”之外,还要“传达”。艺术家在艺术品中所要表现的意境或是情趣,也总希望欣赏者也能感受到并形成共鸣,艺术审美需要有欣赏者,而游戏者本身则既是参与者也是欣赏者,从这点来看,艺术审美与“游戏”也是不同的。再次,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是有社会性的。艺术创作本身总想把自我的活动扩张为社会的活动,并传达给旁人。顾约说:“艺术的情绪根本是社会的,它的结果是扩张个体的生命,使它沉没到较大的较普遍的生命里去,艺术的最高目的就在产生带有社会性的美感的情绪。”^{[13]128}除此而外,“谷鲁斯、顾约、马夏尔和兰格斐尔德诸人都谈到了艺术的社会目的性,他们以为社会性存在与否,就是艺术和游戏的根本区别”^{[13]28}。

可见,游戏与艺术的本身都是为活动而活动的,它们同是自由的活动,体验的都是内在所伴随着的快感,最终都指向人在自由中所体悟的幸福。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里说,人生最后目的在求幸福,而幸福就是“不受阻挠的活动”。“我们在艺术中感受到的东西就是那种没有物质性内涵的完美的情感生活,我们已从肩上卸下了激情的重负,剩下来的只是我们的激情在摆脱它的重力、压强、引力后,那种微微颤动的内在情感。”^[11]艺术审美参与到当代生活,就是试图让我们在追求物质、体验审美游戏的同时,能陡然体会另一番景象:原来生活的苦难历程完全可以变为一次观光旅程,那些布满荆棘崎岖的求知之路突然会变为自由、幸福的探寻之路,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生存的意义。

(三)审美教育乃构建完美人性的桥梁

席勒美育观是立足于对他所处那个时代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在《书简》的第二封信里表明了对这个陷入实用与功利时代的担忧,“实用是这个时代的巨大的偶像,一切力量都要侍奉它,一切才能也要尊崇它。在这架粗俗的天平上,艺术的精神功绩没有分量,……而科学的界限越扩张,艺术的界限也就越缩小”;在第六封信中继续了他对这种人性异化状况的深切忧虑,“现在,国家与教会,法律与习俗都分裂开来了;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分离了。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就把自己培养成了碎片;由于耳朵里听到的永远只是他发动起来的齿轮的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他就永远不能发展他本质的和谐”^{[3]14}。“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国家不能给予的工具,用这个工具打开尽管政治腐败不堪但仍能保持纯洁的泉源。……这个工具就是美的艺术,这些泉源就是在美的艺术那不朽的典范中启开的。”^{[3]23}

席勒认为个别的精神力量的努力虽然可以造就出某一方面特殊的人才,然而只有各种精神力量协调一致才能够造就幸福而完美的人。如何建立这种和谐、完美的人性?席勒将目光投向美,他认为只有通过审美的教育才能达到此目标。在这里,席勒对美的艺术表达了很高的期许,意图破除实用至上、艺术无用的观点。因此,对完美人性的追求也成为席勒美育思想最有力的诉求,他认为唯有在艺术的领域,通过游戏性审美的介入,才能改变人的异化状态,弥合人性(感性与形式冲动),把现代人从工具理性的牢笼中解救出来。这样一种乌托邦式的理论方案,或许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有问题,但能帮助我们在日益物化的世界,反思人性,反思我们存在的意义,反思艺术教育。“艺术教育绝非仅仅知识与技能的传授,而是哲学精神层面的教化和升华。乃是对人性的培育,乃是对完美人性的开启。”^{[3]33}

在席勒看来,这是一个完全可以实现的理想。他认为,人具有双重天性,一种是“状态”(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所谓“质料因”),是人在流逝着的时间中获得的一个不断变化的感性世界;一种是“人格”(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所谓“形式因”),是恒定的,是保持着一种内在的将感性材料组织成规律的自我身份。这两种天性都需要一种力量去实现它们各自的对象,即“状态”要把我们身内的必然之物转化为现实,“人格”欲把我们身外的现实之物服从必然性法则,因此这两种基本内驱力被称之为冲动,一种来自于肉体存在与感性本能的“感性冲动”,与大自然联系起来,使人成为质料,在时间之流中要求有变化,要求“存在的现实性,我们的感知有内容,我们的行动有目的”^{[3]35}。另一种来自人的绝对存在或人的理性本能的“形式冲动”,在状态的千变万化情况下保持住他的人格,竭力使人得到自由,是自由理性的自我“将和谐带入到他的表现的多样性之中”^{[3]36}的要求。因此,一个要求变、一个要求不变的这两种内驱力各有其自身的领域,它们是相互对立的,如果两者中的一方由于对方而牺牲自身的话,人就不能实现他的完整人性,那么,我们只有沟通与协调两者才能恢复人应有的天性统一。席勒认为,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结合起来,就构成一个综合,其中两者的冲突都通过被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面而被克服,就会在两者间形成一个第三种冲动,即所谓审美的“游戏冲动”。此时“游戏冲动”就成为一个桥梁,使得人的双重本性都得以一下子发挥出来,让“从感性依存性到道德自由的过渡”成为可能。这种完美的人性路径悬设即为:从人的“自然状态”经由“审美状态”而臻至“道德的状态”。这样就完成了席勒意向中,通过审美教育完成对理想或完美的人性的瞩望,在从感性依存性到道德自由的过渡的可能中,即在感性之必然与道德之自由的结合中体现“最崇高的人性”的可能。

三、审美“游戏”让通达和谐社会成为可能

席勒《书简》中的“碎片化”是对当时社会中个体人的生存状态做了一种比喻性说法,他认为这种成为“碎片”的人,并不是人的真正状态,而是人天性的一种分裂,在这种分裂状态下,人的统一意识被割裂开来,人也无法实现自己潜能的自由。因此,在席勒看来,现代文明的发展并没有为个体的人带来和谐和自由。

马克思在他的早期思想里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人的状态是对人的某种完善性的一种异化,尤其对工人阶级而言,“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4]。席勒在对时代的人的分裂的状态进行揭示后,在开始分析造成这种人性分裂的原因的时候,却与马克思开始走上了另一条不同的道路。马克思立足于政治、经济的角度进行分析,而席勒则以康德对人的知性分析为基础,从人性本身寻找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席勒认为是由于感性和理性的分裂而造成人性的失衡,所以人才具有种种异化的表现。他相信只有在感性和理性保持统一与平衡时,人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人,他也确信只有通过审美来弥合分裂的

人性才是通向未来的唯一途径。席勒从人本主义的立场去看待历史,并把历史的发展看作是意识所决定的,因此认为审美教育应承担起历史变革的重要角色。虽然席勒最终的解决依然是在思想意识内进行,但他确定:“美和真并不是虚言!不能向外求,那只是愚夫;这是你内心永远的产物。”^[15]席勒美育观的重大意义在于,美育向实践迈进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大步,这一步使美育与广阔的社会生活紧密联系起来。

在席勒看来,期望国家改善这种人性的糟糕状况是不可能的,“因为处于现在这种状况之中的国家,本身就引起这种弊端,而理性在观念中设想的国家,也不可能创立这种更好的人性,倒是它本身应该首先建立在这种更好的人性基础之上”^{[3]19}。席勒坚持认为:“需要迫使人进入社会之中,而理性在人的心中培养起社交原则,那么唯有美才能赋予人社会品格。只有审美趣味才能把和谐带入社会,因为它在个体之中造成和谐。一切其他的表象形式都使人分裂。”^{[3]95}席勒的观点是:在自然王国中以纯粹的力量博弈,人的活动受到限制,在伦理道德的国度里,与法则的威严相对立,人的意志受到束缚,而在这两个王国的中间,审美冲动不知不觉地建立了起第三个王国,即“游戏”的自由与快乐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审美的“游戏”冲动使人不论在身体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摆脱了一切称为强制的东西,在审美的国度里,人与人就只能作为形象来相互显现,作为自由游戏的对象而面面相觑。通过自由来给予自由,而成为国家的法则,这种看法有一定的乌托邦性,但通过个体的本性来实行整体的意志,通过建立人性的自由,通过美的自由传达而通达理想社会的思考的方式,则为和谐社会的建立提供了一种智性支持。

那么,这种人性与和谐社会建立的理想范本是什么?席勒认为是古希腊人的生存与社会状态,他这种思想来源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法国大革命后令人失望的结果,让很多知识分子丧失了对以暴力革命来建立自由国家的乐观态度,他们希望能够寻找一个令人憧憬和赞美的理想王国,而成为思想避难的“桃花源”,以图摆脱对现实的无奈感。二是来自于温克尔曼所掀起的对古希腊艺术文化研究狂潮的影响。温克尔曼通过研究发现:“从希腊的国家体制和管理这个意义上说,艺术之所以优越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自由。”^[16]因而反推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即自由是艺术发展的推动力。他认为,希腊人处于人性完满自足发展的阶段,生活的世界充满了安详、完美、个体自由与幸福,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状况,造就了希腊艺术成为人类创造活动不可逾越的最高的美的典范。这些思想直接影响了席勒美育思想的产生,他将自己的艺术活动与政治生活紧密相联系,这点从席勒美育观中以自由为基点来进行审美教育就可以看出其同样的思路。也可以看出,席勒美育思想的核心,是通过对人的审美教育,期望将自然国家最终转变为自由道德国家。

此种说法当然也可以追溯至康德哲学,但席勒没有执着于康德所谓“美是道德的象征”的概念上,也没有立足于对道德这一“自由概念的领域”自身自足性的考察,而是把“道德的状态”置于更高的人性格调之上。如果说,是生存的需要使人联结为社会,是道德律在人心中树起了理性的法则,那么,是“美”也唯有“美”才赋予自然人在转化为道德人的过程,以完美理想的人格,才能让这完美人性的和谐植根于每个人的心中,才能最终让社会的和谐真正成为可能。

四、结语

席勒看到时代的弊病,提出用美育改变现状。他不寄希望于政治经济改革,只求人性人心的改善,他试图从审美走向政治自由,将斗争完全置于艺术的领域里开展,这也是当时唯心主义学者们的普遍性主张,因此,这种认识带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席勒面对由工具理性、实用理性所主宰时代而带来的人性割裂困境,他期望用艺术审美弥合和观照残缺人性的思考,却有着重要的当代启示。席勒所坚持的,唯有美才能让人在行为与思想之间自由翱翔,让感性和理性保持统一与

平衡,人才能成为真正完美人性意义上的自由人的理论构想,也让我们更深地了解到美育的深层价值。美的艺术作为人类理性的一种创造力的“能力解放”,不是逃逸生活、远离社会的“静观”与“避难所”,而是培育美好、追求自由、完善人性,通达和谐社会的一条可行路径。

参考文献

- [1] 黄克剑.美眺望虚灵之真际:一种对德国古典美学的读解[J].艺苑,2007(9):4-15.
- [2] 席勒.席勒文集[M].张玉能,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115.
- [3]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张玉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 [4] 约翰·杜威.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M].赵祥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73.
- [5] 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M].衣俊卿,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248.
- [6] HUGO S J. Man at Play[M].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press, 1967:65.
- [7] 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M].多人,译.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49.
- [8] 卡尔文·斯·霍尔,等.弗洛伊德心理学与西方文学[M].包华富,等,编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153.
- [9] 邵智.马尔库塞理性批判思想探析[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1.
- [10] 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3.
- [11]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81-182.
- [12] 张俊.美与自由教育[J].哲学动态,2020(10):126.
- [13] 周宪.艺术理论基本文献(中国近代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 [14] 北京大学哲学系.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264.
- [15] 李泽厚.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161.
- [16] 温克尔曼.希腊人的艺术[M].邵大箴,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09.

Interpretation of Schiller's Concept of "Game"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DING Xin-chun

(School of Music,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 Jiangsu, 223300, China)

Abstract: Schiller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aesthetic educ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aesthetics. Facing the dilemma of split human nature brought about by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practical rationality, he thinks that only art can enjoy absolute immunity and remain unconstrained by autocracy. He advocates that aesthetics should replace religion as a way of communication. The aesthetic "game" is key to redress alienation, restore split human nature, and attain freedom, perfect human nature and social harmony. His concept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s of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for us.

Key words: aesthetics; game; freedom; Schiller; art

〔责任编辑:王建霞〕